

#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5人谈

## 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编者按

2025年12月19日，大理州社科联牵头，州委政研室、州委党校、州白研究院、大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滇西应用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六家单位联合举办了大理州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理论阐释研讨会，全面解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的实践要求。研讨会上十位社科专家精准把握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要求，结合大理生态保护、产业转型、文化传承、基层治理等十个重点方向，聚焦“实践创新与高质量发展”和“深化改革与基层治理”两个主题深入研讨。

本期刊发的5篇文章均为大理州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理论阐释研讨会上研讨课题的成果。

###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实践路径

——基于云南多民族地区的实证分析

王国籍强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要“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并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建设”作出战略部署。这为新时代依托文化力量深化民族团结、巩固国家认同提供了根本遵循。近年来，云南等地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与中华文脉传承为着力点，探索出一条以文化实践厚植认同、以文脉传承凝聚人心的生动路径，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富有启发的实践样本。

#### 以“一体四维”构筑认同根基

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深厚的文脉传承，是各民族共有共享的精神财富。它们超越地域与民族的界限，成为联结历史与当下、沟通个体与集体的情感纽带。云南的实践表明，无论是祥云绵延的红色驿路、剑川深厚的古城文旅，还是凤翔绵长的书院书香、宝丰生动的古镇记忆，共同的历史叙事与文化符号构筑了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守护这份文脉，就是守护集体的记忆、共同的情感与未来的愿景，这深刻印证了“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这一根本逻辑。

从云南的实践来看，文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厚植遵循着清晰的“一体四维”逻辑。“一体”即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四维”则是这一认同得以具体建构、深化和巩固的四个关键面向。

一是以红色文脉铸魂，夯实政治认同根基。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精神财富，深刻蕴含着“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从大理翁家口主题馆展现的第一个地下党组织的星火历程，到祥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教育馆呈现的“红色基因+民族工作”交融史，红色文脉将党的初心使命、国家叙事与各民族的奋斗记忆紧密联结，使“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从政治要求内化为基于共同历史命运的情感自觉与价值追求，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坚实的政治与思想根基。

二是以非遗文脉传情，激活情感认同源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民族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的“活态文明史诗”，承载着共通的情感表达与审美追求。漾濞阿尼么的“乡村好歌汇”、洱源凤翔书院的公益非遗课堂、宾川迎侨堂的侨批家书、剑川的精湛木雕，这些技艺与仪式在活态传承中促进了“美美与共”的文化对话。它们在体验与共享中，让情感共鸣自然生长，成为联结各民族心灵的无形桥梁。

三是以共生文脉聚力，拓展发展认同路径。文化认同需融入发展实践，转化为共建共享的合力。宾川迎侨堂以“侨”为桥联结四海，云龙宝丰推动文旅融合促增收，漾濞阿尼么以“歌治”完善乡村治理，这些实践揭示了一条关键路径：当文化文脉与高质量发展需求深度融合，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民生福祉，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理念就有了坚实的物质依托，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便在共享发展红利中获得持久动力。

四是互嵌文脉润心，深化社会认同实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关键要落细落小、融入日常。推动各民族在空间上互嵌、在文化上交融、在心理上契合，是实现深度交融的关键。剑川古城的街巷格局、凤翔书院的多元文化平台、翁家口治理与文脉的结合，共同实践着“空间互嵌促进交往、文化互鉴增进理解、价值共鸣凝聚共识”，让“中华民族一家亲”从认知概念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生活体验。

#### 从文脉传承到人心凝聚的实践路径

基于上述逻辑，云南形成了四条特色鲜明的实践路径，将文化维度有效转化为凝聚人心的社会工程。

一是以教育展陈固化集体记忆。系统性、创新性地呈现共同历史与文化记忆，强化教育展陈的育人功能。一方面，打造“主题场馆+研学基地”矩阵，如祥云主题教育馆、宾川迎侨堂等，运用现代展陈技术，将宏大叙事转化为生动可感的“地方性知识”与“集体记忆”，通过“行走的思政课”增强体验式学习效果。另一方面，推动优质文化资源进教材、进课堂，将民族团结进步故事、非遗传承案例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与干部培训课程，培养专业讲解员与师资队伍，使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通过系统教育深入人心。

二是以活态传承激活情感共鸣。推动非遗从“静态保护”向“活态共享”转变。其一，开展“非遗进社区、进校园、进景区”活动，如凤翔书院的周末公益书画课、漾濞阿尼么的“乡村好歌汇”，让各族群众在“共唱、共舞、共做”中参与非遗传承；其二，推动非遗与现代元素结合，利用数字技术，开发非遗数字藏品、沉浸式体验项目，如将剑川木雕与现代设计融合，让非遗既“守得住传统”又“接得住当代”；其三，建立“非遗传承人+专业人才”协作机制，吸引文创设计师、青年创客参与非遗创新，培育兼具民族特色与时代美感的文创产品，让非遗成为联结各民族情感的“文化符号”。

三是以空间互嵌促进交往交融。构建“物理空间—社会治理—文化认同”的融合机制。在空间规划上，推动城镇社区、乡村聚落的“嵌入式”布局，配套建设共享的文化广场、非遗工坊、书屋等公共设施，为日常交往创造有利条件。在治理实践中，可借鉴翁家口“党建+治理+文脉传承”模式，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容有机融入村规民约、社区公约与网格化管理中。例如，阿尼么村通过创作传唱“村歌”等形式，将文明公约转化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表达，使文化认同有效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在文化生活中，常态化开展各族群众共同参与的节庆活动、文化赛事，让交往交流交融在自然亲切的日常场景中持续深化。

四是以文旅融合实现价值共享。将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为发展资源与富民产业。一方面，培育“文化IP+产业集群”，如宝丰村的“古镇研学”、宾川侨乡的“侨文化旅游”，形成以特色文化为核心的产业链，带动各族群众就业增收。另一方面，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在文旅项目中明确并保障各族参与者的合理收益，如剑川木雕非遗工坊实行“传承人+农户”合作模式，确保发展成果由各民族共享，让各族群众在共同的产业链上成为利益共享、命运与共的伙伴。文化认同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注入持久而深厚的内生动力。

党的二十大及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战略部署，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云南“文化同心”的系列实践启示我们，当赓续中华文脉成为各族群众的自觉行动，当“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成为普遍的价值追求，便能形成人心凝聚、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纽带。

（作者系滇西应用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大理州正处在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如何借助新质生产力理念破解发展难题、培育新动能，是摆在大理未来发展方向上的关键任务。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比较优势。**大理州历史文化与自然风光资源丰富，素有“文献名邦”之称，是云南唯一的国际湿地城市，成功入选第二批国家碳达峰试点名单，被确定为国家级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示范州。大理州高原农业特色鲜明，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居全省前列，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总产值比提升至2.27:1，农业经济总量稳居全省第二，2024年大理州出口高原特色农产品24.8亿元。大理州工业重新起势，硅光伏、绿色铝、新能源电池等产业初具规模。2025年前三季度，全州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5.5%，新能源产品产量迅猛提升，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对规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14.0%。大理州区位交通条件优越，作为滇西中心城市以及“大滇西旅游环线”的核心

节点，大理正积极融入RCEP与中老铁路经济带，吸引大量客流，并逐步成为滇西地区的物流集散中心。

**发展新质生产力面临的挑战与风险。**大理产业结构面临调整的阵痛，2024年大理州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为28.4%，低于全省32.8%的平均水平。工业占比从2015年的30.7%下降至2023年的19.1%，工业基础仍然较为薄弱。2024年大理州外贸依存度仅为1.44%，远低于全省和全国平均水平，且97.3%为农产品，出口结构严重失衡。大理州创新资源聚集不够，全州R&D经费投入强度仅为0.85%，不足全国平均值的三分之一，且低于全省平均值1.17%。2024年大理州民营经济综合积分排全省第7位，招累指标为民营经济增长增加值增速、民营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及每千人拥有民营经济市场主体数。投资结构面临新的压力，2024年固投（不含农户）和产业投资同比下降低24.6%和20.8%。2025年1—10月，全州实际使用外资仍集中在电力、农林牧渔业推广服务等传统领域，新兴领域的布局投资难度依然较大。大理州区域发展不均衡，2024年大理市占

全州GDP比重为30.6%，大理市、祥云县、鹤庆县、宾川县四县市GDP占全州比重为62.5%。这一趋势在2025年前三季度还略有扩大。新旧动能转换缓慢，捕捉政策和项目落地成效的主动性不足，速度不够快。传统优势产业增长疲软，新兴产业支撑力还较为薄弱，新动能转换存在明显困难。

**推动新质生产力扎根发展。**技术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坚持工业强州、产业兴州不动摇，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把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瞄准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着力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具体而言，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效益，在农业领域，延伸乳业、水果、蔬菜等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在文旅领域，探索“低空+旅游”“元宇宙+旅游”等新业态模式，延伸文旅产业链条，拓展文旅消费场景。要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数字经济、生物医药、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聚焦硅光伏、新能源电池等产业链实现聚链成群，形成经济增长的支撑点；加快培育生物医药及大健康产

业。以绿色低碳引领转型，擦亮高质量发展底色。以洱海保护为核心，探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化路径，将生态优势持续转化为经济优势。通过构建水电交易和碳排放交易政策体系，打通绿色能源产业链堵点，加快光伏、风电项目并网，打造“水电+先进制造业”，推动农业绿色转型，实现有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以数智化转型赋能增效，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引擎。加快建设“数字大理”，跨境电商平台建成，低空经济实现“0到1”突破。优化营商环境，激活各类主体活力。加强要素保障，优化创新生态环境，充分利用民营经济政策，扩大民间资本投入；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促进数据高效流通。推进区域协同，破解发展不平衡难题，加速大祥巍一体化进程，推动产业转移与人口合理分布，构建多极化支撑格局。坚持开放合作，融入新发展格局，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面向印度洋国际陆海大通道沿线国家城市的对接合作，拓展跨境电商规模，将大理打造成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开放前沿阵地。

（作者单位：大理州委党校）

## 乡村旅游的功能与洱海流域生态价值的实现

□ 夏志贤 陈自海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十五五”期间“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的发展目标，作出了“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增强发展绿色动能”的重大部署。这些重要论断，为推动大理乡村旅居产业发展和洱海流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了科学指引。

在“美丽中国”视域下准确把握乡村振兴的功能。根据产业生态化理论，乡村旅游产品具有四重功能。一是旅居客群资源吸纳，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乡村资源对比城市资源而显现的“差异性”和“优质性”，将吸引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到乡村旅居，吸纳越来越多的游客在乡村居住。二是资源利用效率提升，相对于游客“忽然而来、忽然而去”，旅居客群在乡村长期工作生

活，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社会—生态”系统稳定。三是区域生产协作参与，乡村旅游客群改变了“游客—消费—垃圾”的循环系统，形成了“旅居客群—消费—生产—生消纳”的环境友好模式。四是区域环境治理协同，旅居客群与村民能够在环境治理，甚至基层治理中有效实现共建共治共享。

理清洱海流域发展乡村旅游产业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机制。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与洱海流域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存在着目标、动力、资源与技术的耦合。一是目标耦合，都是要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绿水青山是洱海流域乡村旅游的核心竞争力，其产品的绿色收益又为洱海保护提供了坚实持久的内生动力，二者共同指向经济—社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二是动力耦合，都是源于生态资源向生态产品、生态商品转化。生态约束倒逼乡村旅游产业摒弃粗放模式，转向精品化艺术化的深度旅居体验；而旅居产业所创造的经济价值，推动生态资源向生态产品、生态商品成功转化，形成了“因保护而发展、因发展而保护”的良性循环。三是资源耦合，都是基于良好的生态环境。洱海流域发展乡村旅游产业，离不开美丽的“玉洱银苍”，这也是衡量流域生态价值的根本尺度。通过发展乡村旅游，获得了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要提升生态治理成效。

积极拓展洱海流域发展乡村旅游产业实现生态价值的路径。一是加强乡村旅游产业规划引领。对流域多数乡村而言，旅游变旅居、游客变居民，不会自然发生，须有规划引领。要考虑乡

村环境综合承载能力，不能一拥而上、遍地开花，要因地制宜、因村施策。还要处理好旅游产业与旅居产业的关系，发展旅居产业不能挤压传统旅游业。二是建立健全乡村基础设施。旅居客群主要是城市居民，来大理旅居的前提是当地要有满足现代生活的公共基础设施。旅居客群用水用电普遍高于农村居民，这要求农村原有水电管网、交通道路等公共设施进行系统改造，不仅要满足旅居客群需要，还要规避污染风险。三是要强化乡村基层治理能力。过去乡村治理主要立足于农村生产生活、以农村居民为主体，旅居客群进来后，乡村治理要面向旅居客群，服务主体更为多元、工作内容更为多样。

（作者单位分别为大理州委党校、西南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 做好基层矛盾纠纷化解与命案防控工作

□ 杨鹏程

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重要保障。社会治理，是平安中国建设的重点任务，而基层矛盾纠纷化解与命案防控工作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要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落实管理责任。**一是各级党组织要加强对社会治理工作的领导，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发挥党建引领作用，组织党员干部下沉社区，参与矛盾纠纷排查、重点人群稳控等工作。二是要站在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看待矛盾纠纷化解和命案防控工作，思想上要重视，认真处理发现的问题，公道正派，洁身自好。

有些深层次的矛盾纠纷虽很常见，但要从命案的角度去认识。对报警的纠纷要认真处置，不要漠视轻视。三是走群众路线。群防群治、互联互通，实行网格化管理，发挥有威望的作用，鼓励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四是压实各级责任，强化考核，将命案防控工作纳入基层社会治理考核体系，建立定期通报和督查制度，建立“一案双查”机制，既查案件本身，又查背后的管理漏洞和责任落实情况。

**加强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一是完善“一站式”多元化调解机制，建好综治中心。整合政府派出所、司法所、乡法庭、律师事务所、工青妇、行业协会等资源，形成合力，推动矛盾纠纷就地化解。建立相关部门和基层组织的联席会议制度，加强信息共享和协作配合。二是建立“乡镇—村（社区）—网格—楼栋”四级组织体系，覆盖物业、业

委会等新兴领域，消除治理盲区。三是科技赋能，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构建基层社会治理信息平台，实现风险预警和精准分析研判、精准防控。四是做好重点场所、重点人群排查和矛盾化解工作，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对重点人群，要进行动态排查和分类管理，落实监护责任。对困难的人群要注重从生活层面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

**注重普法，加强文化道德教育，净化社会风气。**要坚持开展常态化普法活动，重点宣传与民生、治安相关的法律法规，提高群众法治意识，让学法、守法、尊法、用法蔚然成风。培育“法律明白人”队伍，发挥其在基层矛盾化解中的作用。要加强文化道德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相互尊重、理解互助、敬畏生命的良好氛围。要净化环境，打击群众反映强烈

的违法犯罪活动，消除黄赌毒现象。倡导科学，去除封建迷信，维护公序良俗。通过村规民约，破除陋习，纠正不良的酒风、村风。

**弘扬新时代“枫桥经验”，提高群众工作能力。**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提高群众工作能力，融法理情于一体。合法合理的要解决，不合法合理的要引导，对那些生活压力大的人，要给予关心和温暖，解开他们的心结，增强战胜困难的信心。

**不断提高基层干部自身素质。**矛盾纠纷化解与命案防控，是一项综合性、又具体烦琐的工作，对干部的素质要求较高。要注重提高政治素质、法律素质、道德素质、心理素质、身体素质、文化素质，使基层干部成为处理矛盾纠纷的行家里手。

（作者单位：大理州委党校）

## “五治融合”：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强劲引擎

□ 汪燕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神经末梢”，是社会的稳定器、经济的蓄水池、文化的传承场。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强乡村治理，完善社区治理”。

“五治融合”乡村治理模式以系统性思维构建起了“政治引领、自治强基、法治保障、德治教化、智治支撑”的现代乡村治理体系。其中，党建引领在体系中处于统领地位，为乡村治理提供强有力的政治保障；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形成优势互补，发挥集成效应；智治”通过科技赋能，为乡村治理提供技术支撑。“五治融合”因其具有系统性、协调性、高效性特征而助力于乡村治理现代化。

大理州主动对接云南“3815”战略发展目标，服务于“两个建设、三个走

在前列”的发展定位，不断提升边疆民族地区治理效能，“政治”方面，通过创建“党建+网格化”管理模式、“组织+合作社”发展模式、“党员+志愿活动”服务模式等不断增强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核心引擎作用。“自治”方面，因地制宜创新自治组织形式，涌现出诸如巍山县打竹村的户长会、洱源县郑家庄的治安联防队、漾濞县阿尼么村的合作社理事会等自治载体。“法治”方面，推行“法治副校长”制度，由政法干警担任“法治副校长”，与村“两委”和“法律明白人”结对联动，此外打造“白曲唱法、白语说法”的普法新模式。“德治”方面，打好“非遗+德治”“古训新风+德治”等组合拳，此外开展“行走的廉政课”“火塘话家风”等特色宣讲，增强德治感染力。“智治”方面，打造超級

全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近年来，大理州先后荣获“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州”“全国市域社会治理合格城市”等称号。

展望未来，大理州在纵深推进“五治融合”乡村治理实践中应强化三方面的重点工作：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夯实乡村治理的政治保障，以党的政治功能为乡村治理提供方向，以党的服务功能推进乡村社会有效运转，以强大的组织体系确保乡村治理和谐有序；注重“融合”，明确“三治”的组合方式与结构性配比；数字赋能，打造简约高效的数字化治理生态。通过以上举措，力求实现“五治融合”乡村治理模式的迭代升级和实践的创新发展，进而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实支撑。

（作者单位：大理大学）